



旧中国的军服演变

中国早在春秋之前就有了军服,但真正出现军服当属上篇所说的第一次军服改革。到了秦朝之后,秦始皇对军服又有了更新和发展。

秦始皇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。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墓发掘出来的秦兵马俑,再现了二千多年前秦王“带甲百万、车千乘、骑万匹”的雄壮军威。这些披坚执锐的武士形象,是秦朝军队将士的真实写照,其磅礴气势,令中外学者无不叹为观止,被称之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观”。

秦兵俑共穿七种不同的甲衣,又可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:一种护甲由整片皮革或其它材料制成,上嵌金属片或犀牛甲片,四周留有阔边。这种甲为将领穿着。另一种由方形甲片编缀而成。穿时从上套下,并在里面衬以战袍,是普通士兵的装束。可以看出,秦朝军服已有明确的职务、等级之分。而将士服装的区别在当时对于作战的组织、指挥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。



中国军服

中外军事博览·军衔军服卷之九



西周、战国武士服



秦将军、骑士、步兵服



到了西汉时期，随着炼铁业的发展，铁制的武器取代了青铜制的武器，盔和甲也用铁来制作了。铁制铠甲作为军队的主要服装而登上历史舞台，使皮甲黯然失色。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多处汉代遗址上发掘出许多铁甲片。经专家考证，那个时代的铁甲正逐步从粗陋到精致，经历着一个更新变革的过程。汉代的铁甲，在古代又成“玄甲”，以与金甲、铜甲相区别。曹操的儿子、魏文帝曹丕有诗曰：“戈矛成山林，玄甲耀日光”，形容当时军容之盛。1968年，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，出土了一副铁铠，共由2859片铁甲片缀成，经修复后，是一领重达16.85公斤的鱼鳞甲。

在汉代，除了中原地区大量使用铁甲，北方少数民族仍使用皮甲。南方有些部落还使用藤甲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描写诸葛亮七擒孟获时，曾大战乌戈国藤甲兵。藤甲是用山中老藤，油浸日晒10多次结成，刀枪难入，落水不沉。但藤甲怕火，藤甲兵就是被诸葛亮用火攻而全军覆灭的。

唐代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，国家统一，经济繁荣，文化事业高度发展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当时的中国，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。灿烂的中国文化，传到世界各地。直至今天，我国东邻的



中国军服

有些国家，仍把唐朝的服装作为正式的礼服。

唐朝的军服，在前代基础上，也有很大的进步与改革。史称唐代“将帅用袍，军士用袄”。唐代将帅战袍上，绣以狮虎花纹，以示勇猛威武。将士的盔甲，也更加精致。据记载，唐代的铠甲有13种：明光甲、光要甲、细鳞甲、山文甲、乌锤甲、白布甲、皂绢甲、布背甲、步兵甲、皮甲、水甲、锁子甲、马甲。可见唐代军服式样之多。唐代将领，大多穿明光甲。唐代甲的质料，有铁做的、皮做的、绢布做的数种。其中主要的、最为精致坚硬的是铁做的甲。另外，还需要提及的是唐代时兴金甲。唐太宗



唐代武士服

中国军服



李世民在他登基之前，就曾披挂过这种金铠甲。据唐代的《太宗记》记载，公元621年，年方22岁的年轻将领唐王李世民英勇善战，率领唐军一举消灭了竇建德的夏军，并迫使割据一方称王的王世充不战而降。为了庆祝这一决定性的胜利，李世民身披金甲，率铁骑万匹，甲士5万，在太庙前举行凯旋礼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当时金甲是十分贵重的，仅作为仪仗庆典而用。当然，披金甲不是李世民的首创。早在李世民以前的前秦苻坚，就曾制作过金银甲。北周时连皇帝的侍卫都披着金甲或银甲。以后，披金银甲的例子也不乏其人。但是，这些金银甲都是讲排场，作依仗用的，不是实战用的防护装备。

五代十国之后，宋朝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。宋太祖赵匡胤很重视军事装备的生产，如975年，赵匡胤亲自校阅造甲作坊所制造的各种装备。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，各种装备的产量和质量有很大提高。

宋朝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曾记载过一种盔甲，名为“青堂羌族纛子甲”，采取冷锻工艺制作，“柔薄而韧”，在50步之外，用强弩都射不透。

随着甲冑防护力的加强，其重量大大增加。宋代一副铁甲重约50斤，再加上兵器和其它装备，足有上百



中国军服

斤。

沉重的铁甲，与其说是穿在身上，不如说“挂”在身上。“披挂上阵”，即是形容武士身着盔甲，参加战斗。全副披挂的武士行动十分不便，上下马都靠别人扶持，在皇帝、要臣面前无法行跪拜礼，只能拱手作揖致礼，“甲胄在身，免行全礼”，所以军礼规定“介冑不拜”。

“甲午战争”后的近代中国军服改革

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中国进入近代。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，逐步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地位，割地赔款，国库亏空，军队战斗力脆弱。1894年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，堂堂“大清王朝”，竟然输给人力、物力比自己弱得多的日本。消息传来，举国震惊，朝野改革呼声甚高。清政府为维持自己的统治，决定采纳众议，改革兵制，效法西洋，建立一支新型陆军。从此，中国军队走上近代化道路。

由于近代新式操练的实行，作战方式的改变，迫切要求改革清军旧式服制。随着火器射程的延长和杀伤力的增强，两军交战距离较之弓箭时期要远，而人员特别是指挥官的伤亡率却比过去要高，这就要求军队的服装要利于隐蔽；在官兵制服的区分上，自己人在近处利于识别，而在战场上敌人亦易于“指目”，危及军官。同时，



清朝北洋舰队水兵服

随着制式教练的推行，部队“操法起伏，分、合、退、旋转，均贵迅捷”，要求军服必须“改用短服，一洗旧观”。另外，随着兵种的增多，为便于战时指挥和平时管理、训练，官兵军服上需要标明军兵种和勤务专业。而清军那时的服装却是“糅杂参差，习为宽博之容，颇乏严整之象”，那种长袍马褂式军服，既不庄严整齐，又不适应操战，特别是军官与士兵的服装“分别太显，殊非战时所宜”，官服“颜色华丽，易招敌目”。此外，随着门户开放，各国军队交往增多，要求有一套与国际上大体相近的服装。因此，军服改革迫在眉睫。怎么改呢？谋臣们



中国军服

提出了一个改革制服的方案,这个方案总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:

一是“窄小适体,灵便适宜”;

二是“敌人远视,官兵莫分,军队相逢,尊卑各判”;

三是颜色要“视线愈远,愈不能真”,“使(敌)人不能远望瞄击”;

四是军帽要“前檐稍宽,取蔽风日,以便瞄准命中”;

五是“肩头列号,自官长以至兵目,各按等级次第,分设计号,务使截然不紊”。

大臣们提出的这套制服方案,实际上就是照搬当时西洋军队的服制。他们对这种军取给予极高评价,说清军如果能够采用,“外容即整,气象自新,军威可以骏肃,号令可以齐一,操战可以便利,交际可以适宜”。

由于积习过深和保守势力的阻挠。以上方案没有完全实施,清军服装改革不够彻底,只在军警服装和学生操练用的服饰上作了一些改革,其它依然如旧。尽管如此,改革后的新军军服,已具现代军服的特点。但遗憾的是,无论脚登长筒靴、腰挎指挥刀的军官,还是打绑腿、扛步枪的士兵,大檐帽下、后脑勺上都拖着一根长辫子,令人啼笑皆非。

中国军服



1911年，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，推翻了清朝的统治，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。民国成立以后，发出《剪辫通令》，全国纷纷响应，延续二百八十多年的辫发陋习，终于除尽。衣冠服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首先，废弃了千百年来衣冠“昭名分、辨等威”的传统习惯及规章制度。接着，民国政府又仿照西洋诸国服制，颁布了军队服制条例。但由于这些条例不完全切合中国国情，而没有能够实行。当时，由于国内军阀割据的形势，中国军队的军服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式。但因受当时世界列强军队服装的影响，式样上大体相近，而与东邻日本的军服更为接近。当时军官、士兵一律戴大檐帽，军官穿长筒靴，士兵着高腰皮鞋，只是服装的颜色、式样和制作材料不同而有所区别。

此后的几十年间，随着军兵种增多，战场分工越来越细，军服的种类也大大增加。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纺织技术的提高，大大促进了军服材料质量的改进，但总的来看，民国时期军服的式样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


甲衣的古老历史

在距今约 50 万年前的遥远年代，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开始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区域内繁衍、生息，考古学上称他们为“北京人”。

北京人在漫长岁月的进化过程中，通过与自然界的斗争，逐步学会和掌握了最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技能，其中包括缝制衣服。

1927 年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古人类遗址中，发掘出一枚骨针，据此推断，山顶洞人在一万八千年前就已经开始用兽皮缝衣服了。至于用皮革做甲衣来保护身体，《史记》上说是帝杼“作甲者也”（《夏本纪》）。杼是夏代（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）第七代君，因此甲似乎在夏前期（约公元前 19 世纪前后）就已经有了。

1935 年在河南安阳侯家庄 1004 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了商代的皮甲残迹，出土时皮革已腐烂成粉末，只有甲面用黑、红、白、黄四色漆彩绘的图案纹理仍遗留在



土上。残迹的最大直径均在40厘米左右,据此认为是整片的皮甲,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、比较可信的一个实例,时间可以推定为商代后期。

与皮甲残迹同时出土的还有140顶左右的青铜胄,它们和兵器放在一起。铜胄都是用范浇铸的,合范的缝在胄的正中间,胄顶有竖立的铜管,用于安插羽毛之类的缨饰,胄的左右两边和后脑部向下延伸,用以保护耳、面颊和后项。胄的剖面为O形,表面都经过打磨。但是



河南安阳出土的青铜胄

里面却很粗糙。这说明胄的里面是有织物或皮革做内衬的,否则不堪使用。除了安阳出土的铜胄外,在江西新干县大泽洲乡商墓也出土了一顶青铜胄,造型与安阳的略有不同,花纹和制作比安阳的更为精美。这是南方地区发现的第一件青铜胄。



中国军服

这种原始甲胄还有两个实例，一是 20 世纪 30 年代云南傈僳族使用过的皮甲，这种皮甲用两块长约 1 米的长条形生牛皮相叠、缝合而成，在约三分之二处开挖一条舌形缝，沿剖开的缝将三分之一的皮革向下折而做成胸甲，另外三分之二的皮革与竖起的舌形做成保护后脑、项的颈护和背甲。使用时，将头套入孔内，前后两片用带在腋下系牢。二是台湾兰屿耶美人用藤条编织而成的藤甲，形如现代的坎肩，穿时在胸前用麻绳系扎。为了增强防护效能，还在藤甲的表面蒙上 鲛鱼皮，胄也是用藤条编成的。

由此可见，甲衣在中国的古老年代就已出现，并都是用来防护身体的。对此今天虽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，但经考古推断，中国远古时期不仅确有甲衣，而且主要是用于作战时防护。



商代的上衣下裳制

原始社会晚期以来,随着氏族部落的不断兼并,战争越来越频繁,规模也越来越大。商代的卜辞曾记载一次出兵的人数可达三千至五千,多时会到一万三千人。到武王伐纣时,“帝纣闻武王来,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”(《史记·周本纪》,七十万人,现代学者认为是十七万之误)。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,又是几支部队配合行动,如果没有统一的服装,指挥起来必定十分困难。

再从商朝军队的组织成分上看,也能发现戎服存在的可能性。商军的主干是由贵族王室的全体成员(贵族包括商王族的本族成员与低于王族的子族阶层成员)组成,师中的士卒则由居住在商都及周围地区的自由民担任。自由民是商军的基本来源,奴隶也有从军的,但只能服杂役,不能编进师中。根据这种情况,徒兵和杂役没有戎服是完全有可能的,但作为师的这部分军人,特别是王族成员,必定有较统一的“兵事之服”。我们现在虽然不能知道商代戎服的形制,但有一点能基本确定,



中国军服

即这种戎服必定是上衣下裳制。

上古之人为了遮羞蔽体，先在下体前后围以毛皮，是谓蔽前蔽后，后又把整张毛皮中间开孔，套人头中做成上衣。骨针发明后，开始用它把蔽前蔽后两片连缀缝合起来，形成下裳。裳就是现在的裙子，这种衣裳据说到黄帝时“始去皮服布”(《魏台访议》)，并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(《易经·系辞下》)，成为古代服饰的最早形制。



四川广汉三星遗址二号祭坑出土的商代青铜立人像

这一点能从1986年在四川广汉商代祭祀坑出土的一座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身上的服饰得到证实。这尊像铸造精美，除面部、手的造型比较夸张外，其余各部细节都很真实，衣服上的花纹图案和系衣用的绳带、衣纽都刻勒得十分清晰，是非常难得的服饰研究参考资料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铜人下裳左右下垂的燕尾形衣裾，与徐州狮子

中国军服



山和陕西咸阳出土的汉代兵马俑上的袍服样式十分相似，这提醒我们，汉代和战国时期的袍服曲裾正是从商代流传下来的。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也出土过一些玉雕、石雕人像，其衣服也是上衣下裳制。因此可以基本肯定，戎服在当时不可能出现其他新的形制。

商代崇尚白色，《通志略·历代所尚》说：商人尚白，大事剑用日中。戎事乘翰(白马)，牲用白，以白为徽号。既然军队的主力都是贵族子弟，而商王、贵族的服饰以白为主，那么戎服很可能也采用白色。白色中肯定也要掺入一些诸如红、黄、黑等其他的配色，既作为服饰图案、镶边的色彩，又能使各师之间的服色有所区别。



西周的铠甲

公元前11世纪末,周武王经过牧野(今河南汲县北)激战,一举击溃了商纣王的军队,建立了西周王朝。

西周是青铜冶铸的发达时期,当时的官府手工业以铸造青铜器为主,王室或大封建主都有自己的青铜器作坊。随着诸侯分封,青铜冶铸技术也传播到全国各地,所以今天在北至辽宁、河北、东到山东、江苏,南到湖北、河南、安徽的广大区域,都有大量的西周青铜器发现。

在甲冑方面,比较重要的发现有:

1974年,在山东胶县西庵发掘了西周时期的一个车马坑,坑内殉葬1车4马1人,在人头骨部位出土了一组青铜铠甲,一件是胸甲,另两件是背甲。胸甲由左、中、右三片组成,从胸甲周边的穿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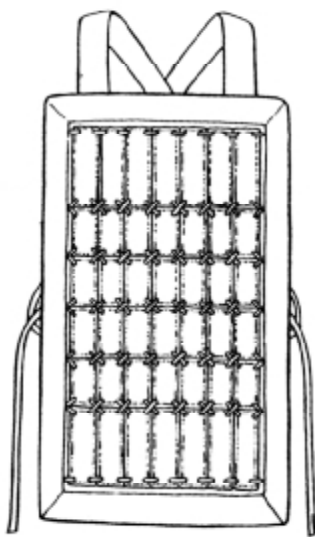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胶县西庵出土西周青铜



和尺寸来看，可能是钉缀在皮甲胸前的，出土时因衣物腐烂胸甲才滑入头骨位置。两件背甲出土时重叠放置，位于胸甲上方。

1975年，在北京昌平西周木椁墓出土了一件青铜胄，铜胄为素面，造型与商代后期的相比较略有差别。

1984年，在陕西长安普渡村18号西周墓中出土了42片青铜甲片。出土时甲片分三组散落于椁室内墓主人脚端及腓骨两侧，经过整理修复，确定是一件铜铠甲，（详见白荣金《西周铜甲组合复原》，《考古》1988年第9期）。从复原的形制来看，铠甲是比较原始的，出土时很多甲片的背后还粘附着呈粉状、褐色的腐蚀物，很像皮革背面网状纤维朽烂后留下的痕迹。据此推断，铠甲是以皮革为衬的，这是我国迄今为止经过复原的年代最早的一件铠甲。



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
铜甲复原图

上述这些出土实物可以反映出西周时期铠甲已逐